

荔泉书院：邓恩铭烈士成长的摇篮

□ 叶文举

荔泉书院是贵州省荔波县历史上第一座书院，同时也是荔波县历史上最重要的书院。它创建于清代嘉庆十九年（1814年），当时的知县蔡元陵为了兴办教育，在城西街孔庙的左方动议修建书院，并先题其匾额为“荔泉书院”，书院由此得名。可惜因财力有限，荔泉书院在蔡元陵的手中并未动土开建，直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时任知县武占熊投入充足的财力方使荔泉书院修建正式提到日程上来，荔泉书院也有了基本的规模。道光八年（1828年），继任知县杨以增又扩建了五间魁星阁、五间讲堂、斋房九间，这个时期的荔泉书院就其建筑而言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规模。不幸的是，同治五年（1866年），荔泉书院毁于兵燹。5年后，新任知县钱墉移址城东县署旧基再建荔泉书院，重新修建了五间上房，十间厢房，正中有三间作为文昌阁，前门还有三间房屋。光绪元年（1875年），在任知县苏忠廷为之书写“荔泉书院”，并悬挂在正门之上。荔泉书院现在的建筑形态基本上是由此奠定的。

独特的运营方式

荔泉书院袭用了书院一般所采用的课试形式，开设有十课，在二月初一日开课，在十二月初二日封课。与其他规模较大的或级别较高的书院不同的是，荔泉书院属下没有学田（旧时官府拨给书院办学用的公田，以其田租收入作为书院运行的经费）或岁修田（书院学田的一种类型，其田租收入作为书院每年院舍维修的专项基金），甚至没有膏火田（书院学田的一种类型，其田租收入用于支付书院肄业生徒的生活费），其用于生徒的膏火主要来自于地方官员、驻地军队人员，甚至是书院本身职员的捐赠，如职员黄玉墀、刘咏芝等曾捐钱一十至四十千文不等，通事杨万清、蒙学清、杨时清、朱树琪等捐钱二十千文，营兵屠兴贵、陈锦云等捐钱一十至二十千文不等。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书院建于晚清时期，商业气息浓厚，这些捐赠的数百千文钱一般交由斋长管理，由他负责“交商生息”，将每月产生的利钱来支付书院的膏火费用，且为了防止贪污或私人占有的可能性，书院将捐钱生息的事务不专门掌握在一人之手，“由斋长轮流经营，勿得擅动，以期久远。”这种膏火运营的方式在其他书院中较为少见。

荔泉书院虽兴建于清朝没落期，且又在较为僻远的县城，但其最初的动机仍然承继了传统书院的兴办宗旨，即以昌兴儒学、服务举业为目的，书院首倡者蔡元陵就说：“并以兴书院、迁学署同举为请”，他拟将代表官方的学署迁到文庙之右，而将代表民间的书院置于文庙之左，“拟构讲堂学舍，俾诸生得以肄业”，文庙、学署、书院，三者相互呼应，显然都是为了尊崇儒学。在蔡氏看来，这都是所



谓的“盖一举而三善备焉”“吾道可南，人文炳蔚”。大而言之，荔泉书院是建立在贵州水族、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集中的偏远区域，而书院教学内容主要是以中原儒学为主，这说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接纳了传统儒学的影响，尤其像杨以增等这样一批中原儒者主政荔波之后，他们实际上想通过书院的教育来教化地方的民众、淳正地方的风俗。

现代教育的母机

众所周知，书院以课考为主要的教学形式，其教学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为了科举考试服务的。建于清代晚期的荔泉书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的形势需要，其教育的理念也有所变化。后期的荔泉书院旨在提升生徒的人文素养，锤炼他们的意志品质，荔泉书院晚期的教育理念颇近似今日所言的素质教育。清代末期荔泉书院的教学活动有其独特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孕育了贵州荔波近现代学校教育新的因素。

1910年，因新式教育的影响，荔泉书院被改称为“荔波公立两等小学堂”，可以说荔泉书院已经由封建时代的传统教育向现代学校教育过渡。1912年，荔泉书院又被改名为“荔波公立两等小学校”，由书院之名到学堂之名，再至学校之名的改易，反映了荔泉书院已经正式进入到现代教育的发展阶段。其后，荔泉书院多次改名，如1923年，改名为“荔波县立初高两级小学校”；1936年，又改名为“荔波县立安涛小学”；1937年，又易名为“荔波县立城区小学”。新中国成

立后，荔泉书院改称为城关一小，现在为玉屏第一小学。这些变化说明荔泉书院已经踏入现代教育不断发展的进程。当然，无论荔波现代教育如何发展，它都是基于荔波县最重要的书院——荔泉书院的久远影响，换言之，荔泉书院是荔波现代教育的母机。

邓恩铭烈士求学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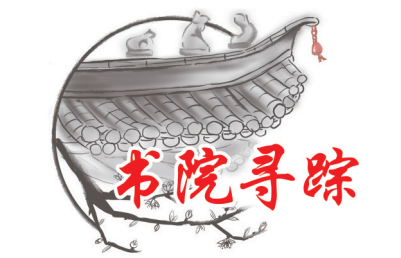
中共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也是最年轻的代表，同时又是唯一中学生的代表邓恩铭烈士1913年来到荔波县县级小学两级高级部（前身即为荔泉书院）读书，度过了近5年的学习生涯。邓恩铭在这里学习了国文、地理、历史、修身等课程，高小的教育开阔了邓恩铭的学习视野。邓恩铭天资聪慧，学习勤勉，又多才多艺，成绩与同班同学肇庆安不相上下，常常互为一、二名。尤为重要的是，邓恩铭在此遇到了青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为深刻的高梓仲老师，高梓仲是清代光绪年间贵州省第一批公费留学生的代表，在日留学期间，受到了孙中山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濡染，拥护辛亥革命，回国后来到了邓恩铭的母校任教，可以说是荔波县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他将科学、民主的精神渗透到课堂教学，使得邓恩铭的眼界不再局限于僻远的县城，而能投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对苦难的民众，目睹饱经沧桑的家国，邓恩铭在高梓仲的启蒙下，应当说在高小读书期间就有了济世安民的远大抱负，在校期间就写过“甲午战役丧海军，辛亥革命推满清。勾通外国那拉氏，直捣皇陵李白成”这样充满战斗激情的诗歌。1915

年6月，作为学生，只有15岁的邓恩铭带头参加了荔波县城反日讨袁的爱国运动，抵制日货，焚烧日货，初现革命斗士的风采。

1917年9月，邓恩铭投奔济南的二叔黄泽沛，继续求学。远赴千里之外的齐鲁大地，邓恩铭固然是因为有升学的直接需求，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其在高小学习阶段就已生成的“救国”与“自救”的愿望。邓恩铭离开家乡学校前所作的多首诗歌业已抒写了他兼济天下、安国兴邦的宏伟抱负与捐躯赴国难、不得中顾私的奉献精神，如《前途》诗云：“赤日炎炎辞荔城，前途茫茫事无分。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述志》诗又曰：“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这些诗歌悲凉之中透着高亢，为了黎民社稷，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情怀力透纸背。邓恩铭临行前与弟弟邓恩荣、邓恩光话别时曾说道：“抬头望家园，河山依然，背井离乡，鹏程远大。改造旧面貌，我着先鞭”，充分体现了心忧黎民、改造社会的担当感与责任感！可见在荔波高小读书的邓恩铭已经是一位志存高远、心怀天下的英雄少年！

当然，荔波书院毕竟是一个县级书院，书院的教学人员数量不会太多，水平也未必很高，格局难免有所拘囿。即使后来被改造为荔波县级小学，其对知识的教育、素养的提升，已远远不能满足少年邓恩铭的求学愿望。邓恩铭在1920年9月14日给父母的来信中就曾慨叹道：“前几天男（即我自称）代表本校出版部上天津参观南开，见人家的学校这么样大，学生这么多，功课这么好，回头想想我的小学母校怎么样？……我的功课怎么样？简单答起来，小学、中学都不好。至于我的功课呢，读了十来年的书，还是一个‘依然故我’。想起来前途茫茫，真叫男伤心呵！”不过，前身为荔泉书院的荔波高小毕竟成就了邓恩铭的少年求学经历，尤其培养了他深沉的爱国情怀，邓恩铭自己也说过：“但是放开眼看一看荔波的青年，能有几个像我所处的地位？不禁我又转悲为乐了”，这也让邓恩铭感动终生。

荔泉书院正门有楹联曰：“百年孔庙泉水绿，卅代弟子荔枝红”。诚如其言，荔泉书院对荔波的儒学传播功不可没，也为荔波近现代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培养了邓恩铭烈士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发展播撒下了红色文化种子。



聚焦公安工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更加注重用创新理念和改革办法破难题、解新问题，不断提升整体效能和核心战斗力。坚定不移走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之路，持续掀起公安数字化改革热潮，建设“公安大脑”，全面构建起基于新技术的智慧公安新机制、现代警务新体系，提升塑造变革能力、打造变革型组织，最终实现浙江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先行。

坚持把“三能”重要指示作为第一要求。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平常时间能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能冲得出来、危急时刻能豁得出来”的重要指示，深入开展“三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打好爱警暖警组合拳，让民警“有困难找组织”成为第一选择。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深化全警实战大练兵，大力加强干部年轻化和队伍专业化建设，着力练就克敌制胜的硬功夫。

（作者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公安厅厅长）

古人重言，将之视为君子品行的重要方面。孔子云：“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他把言、行视为君子之为君子的关键，决定其一生的荣辱。君子的一言一行，可以动天地，需要特别谨慎小心。那么，君子之言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要“慎”

孔子告诫君子，“驷不及舌。”驷，古时由四匹马拉的车；舌，指说的话；形容话语传播之快，只要说出口，就再也无法收回。因此出言务必慎重，说出的话要真实可信，经得住检验，不能信口开河。孔子认为“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在路上听到传闻不加考证而随意传播，这是无德的表现，应该杜绝这种现象。孔子发现一条规律：“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就是说话大言不惭、言过其实的人，往往很难说到做到。他主张“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即君子吃饭不要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工作上勤劳敏捷，说话小心，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朱熹对其中所提到的“言行”注曰：“事难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谨。”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从来不会马马虎虎去对待。

要“讷”

孔子传之甚广的一句话是：“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意谓君子言语要迟钝，工作要敏捷。他还说：“仁者，其言也讷。”《说文解字》释“讷”为“顿也”，指言之钝也。《广雅》释“讷”为“难也”，即说话慢又难，不大容易说出口。为什么不容易出口？孔子说：“为之难，言之得无切乎？”即做起来不容易，说话能不迟钝吗？

正因为这样，所以孔子对那些能说会道、夸夸其谈的人没有好印象，毫不留情地说他们“巧言令色，鲜矣仁”。花言巧语，一副伪善的面貌，这样的人仁德不会多。他甚至说：“巧言乱德。”油嘴滑舌会败坏道德。朱熹对此注曰：“巧言，变乱是非，听之使人丧其所守。”孔子推崇的是“刚毅木讷”，即性格刚强坚毅，为人质朴，不善辞令，这种人接近仁德。孔子是行动派，他重行动，轻言语，害怕以言害行。如果一个人做得好，业绩突出，但不善言谈，没有问题；反之，只说不做，没有成绩，就会给人不好的印象。“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先把事情做好了，再说出来。所以孔子强调对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了他说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一言以蔽之，讷言敏行就是少说多做，这是重要的君子之道。

要“信”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九种要用心思考的事：看要看得明白，听要听得清楚，待人接物脸色要温和，容貌要恭敬，言语要忠实，做事要认真负责，有问题要发问，气愤发怒时要想想可能产生的后果，看见利益要想想是否该得。

在话语方面提到一个“忠”字，《说文解字》释“忠”为“敬也”，尽心曰忠；《左传》说：“无私，忠也”；《周礼》将“忠”列为六德之一。忠，从心，中声，本义为尽心竭力，中心不二，心无旁骛。“忠”往往与“信”相连，“信”从人从言，意为人的言论应该是诚实的，没有任何的虚枉不实。“忠”是指人之内心毫无保留，全心全意，真诚无

君子之「言」

□ 张文珍

私；信则指人之外在言行真实无欺，足以信赖。忠信是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特别看重的，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言论忠实可靠，行为笃实恭敬，这样即使在异国他邦也能行得通；反之，说话不忠信，行为不笃敬，即使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忠信就是一个人的通行证，是立身之本，不忠不信，寸步难行。忠信也是君子治国安邦所依仗的大原则，《大学》云：“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在上者忠诚守信，言出即行，表里如一，就能得到人民的信服，获得人民拥戴；骄横放纵、说到不能做到，就会失去人民信赖，进而失掉民心。

要“宜”

这个宜是指说话要考虑场合、注意对象、符合身份。孔子说过一个人说话容易犯三种过失：“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即是说，没有轮到他说就急不可耐地抢先说，叫作急躁；该说的时候却沉默不语，叫作隐瞒；不看对象的脸色而贸然说话，叫作盲目。他还说：“可与言而不与者，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者，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有人值得信赖，是可以托付的朋友，有话可以与之交流探讨，却不能和他敞开心扉，长此以往就失掉了这个朋友。有人明明是一个话语“转运站”，不可靠，也不能提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却和他推心置腹，无所隐瞒，这就是找错了对象，说错了话。有智慧的人要看讲话的对象，既不错过人，也不浪费言语。

君子说话还要让人看出修养。要安详恬静，沉稳自如，不要动不动大发雷霆、疾言厉色。一个修养好的人，必有静气。俗语曰：溪深水静，人躁话多。《礼记》说君子“俨若思，安定辞”。君子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各种问题，声音容貌显得从容镇定，讲话安详明确，这样才能使人信服。在公共场合要注意不让自己的声音影响周围的人。《诗经》有言：“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温和、宽厚、谦恭、有礼应该是君子的追求。

《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西汉扬雄《法言》云：“言，心声也。”说什么、怎样说，归根结底源于内在修养与思想见地，因此坚持不懈地学习、持之以恒地修炼自我，是君子之言更好、更能打动人、影响人的关键。

